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郭凤莲, 刘 洋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实践论;船山哲学特点;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6-0030-03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Practic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g Chuansh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GUO Fenglian, LIU Yang

(Ideological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eory of practice is a mile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pistemology in Chi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ased on its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carrying forward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t also impri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Chuansh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such as the social ontology,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practical rationalism. There is also certain origin relation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early ideal personality and Wang Chuansh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s practice theor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dopting the specific methods.

Key words: Mao Zedong; practice theory;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Chuanshan's philosophy; ideal personality

列宁曾就哲学史提出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1]据此,毛泽东的实践论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继承。它之所以具有船山历史哲学的特点,大致是遵循这样一条线索: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2]这就是船山历史哲学特点与毛泽东实践论哲学思想的内在思想逻辑。而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在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影子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继承关

系,“我们希望他的坚贞的爱国主义和重知行观的实践思想,在今天将可从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观点,予以新的评价和新的发掘。”^[3]本文就试图从“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实践论”进行“新的评价和新的发掘”,以还原文本式的解读来审视它对毛泽东在具体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4]与毛泽东本人理想人格的关系。

一 毛泽东《实践论》的船山哲学本体论特点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开篇就讲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

收稿日期: 2011-07-25

作者简介: 郭凤莲(1966-),女,湖南郴州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刘 洋(1986-),男,山东诸城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研究。

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5]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本体论上的独特见解,他的本体论核心——社会实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的。

本体论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毛泽东首先从认识论角度入手,这体现他深受在船山“本体——宇宙论”之“大本大源”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接受了船山思想的“一两观”,即“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脉络,他将船山的这种“一体两用”,“两立一见”的辩证关系发展为知与行的辩证统一观。1937年,毛泽东在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备课时就阅读过《船山遗书》,并在《实践论》重新发表时,加上了副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都是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的,毛泽东肯定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指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

这种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成为毛泽东“确立远大志向,达至圣贤理性人格境界的根本方法。”^[6]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这种“宇宙之真理”与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结合在一起,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主张“知了就要行”的实干精神,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重在行事”。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他就说到:“以樛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表达了他当时欲要投身革命实践,造福社会之目的。这与他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二 毛泽东《实践论》的实践理性论特点

船山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实践理性论,它涉及到“知与行”,即对历史的理解与实践。

按照船山的观点,历史前进的保障是“力行第一”。这就是知的目的,就是毛泽东强调的要读“无字之书”,投身社会实践。

船山认为,合理的实践有两种方式,即“理成势”和“势成理”,这两种方式不可分割,相互联系,也即“因理而得势”。这个“理”和“势”在后来毛泽东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中都有所体现。1913年,毛泽东在第四师范求学时曾立下“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

生焉”、“高尚其理想”的圣贤豪杰观。但这并没有让他止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又强调“圣人者,抵抗大恶而成者也”,在这里,毛泽东表现出了贵“大我”贱“小我”的道德境界和敢于投身实践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毛泽东能成为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领袖是分不开的。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检验真理的标准也进行了一番论述,他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7]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扬和探求与其“实践论”的目的殊途同归。

船山的这种实践理性与毛泽东的“知和行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船山的“并进而有功”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表述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强调认识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8]他“博览经史”、事功俱全的知识背景和“练达世情皆学问”的生活阅历为他日后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同时,在学习的方法上,毛泽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上要“甘当小学生”,“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这也正与船山的“不自圣”、“不自倨”的人生信条一脉相承。

三 毛泽东《实践论》的社会变易论特点

有学者总结王船山社会变易论涵盖的三个主题:运动、变化、发展。这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人文社会活动的规律问题。“船山比任何人都要强调历史的变易,演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时间因素所造成的不可逆性,船山充分认识到历史的演化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是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显然,二者都强调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但对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前提就是以人为历史的核心”,^[9]但毛泽东突破了船山所谓“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局限,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人民史观。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变易论的特点。同历史的变易演化一样,人的认识和实践也具有前进的反复性。他首先强调“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然后又指出:“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0]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艰巨性,但他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11]这体现在毛泽东理想人格发展方面,就是他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圣贤思想的扬弃,以及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思想的撞击。直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2]这种早年在毛泽东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对他思维的成型和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方法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四 毛泽东《实践论》的船山历史哲学特点

在船山的历史哲学中,理和势代表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它们具有实践论的意义,但同时也具有史学方法论的价值。首先,毛泽东将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把人放在社会性与历史性之中,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他在《实践论》中写道:“这(知和行)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以科学的实践观,超越了王船山关于认识的主体以及轻视劳动人民实践的观点,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了认识主体的领导方法中的群众路线:群众—领导—群众。其次,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认识的反复性,系统地总结了认识的规律性“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的指导革命实践。”从唯物论出发阐释了认识的两次飞跃:实践—认识—实践。最后,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认识运动的基本秩序,并将其运用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中:个别—一般—个别。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近代湖湘文化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化理性来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性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尤重经世的地域文化代表。”一方面,我们通过

《实践论》的理论渊源做还原文本式的解读后得知,毛泽东通过对王船山历史哲学的批判继承,在《实践论》中将“知和行”的关系概括为“现代的知行合一观”,并“通过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从哲学原理转化为党所领导的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毛泽东实践论所具有的船山历史哲学的特点,与毛泽东本人早年“以圣贤为祈向”的圣贤豪杰观和“大本大源”理想人格是分不开的。

总之,毛泽东的《实践论》将哲学认识论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挖掘其所具有的船山历史哲学特点,这为我们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理性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提供方法论基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1.
- [2]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3,307.
- [3] 贺麟.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J].求索,1985(1).
- [4] 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J].中国社会科学,2007(4):18.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92,283,302.
- [6] 郭凤莲.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79.
- [7]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9.
- [8] 邓辉.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115.
- [9] 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5.
- [10] 方红姣.从王船山到毛泽东——近代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
- [11] 张琳.《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J].理论学刊,2006(4):59.
- [12]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07.

责任编辑:李珂